

蒲公英纪事 - Turbulence

学校究竟是什么？教育因何而起，如何发生，又指向何处？

蒲公英中学身上有几张常常被提到的特殊「标签」。第一张标签是生源。这是一所公益性、非营利性的学校，服务的对象是困难处境下的「流动儿童」。

第二张标签是成绩。初一新生的课业水平在小学三、四年级，而当他们三年后毕业时 70%–80% 以上的孩子能够考上高中。

第三张标签是公益性。这所学校的建设、运营经费都来自社会捐助，教学活动大量引入了社会志愿者资源。

我对「蒲公英」最初的好奇建立在这三张标签上。我原以为，我将讲述的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如何调动社会资源，让流动儿童实现命运逆转的故事。但当我进入这所学校的肌理，我突然意识到，那些打动我的教育日常中的点滴，它们并不特殊。它们的力量在于蕴藏其中的价值。这些价值无关学生的身份、资源的多寡，也无关学校的性质，它们隐隐牵引我走向一些更本质的问题：学校究竟是什么？教育因何而起，如何发生，又指向何处？

Featured in *Lifeweek*, December 6, 2021. Before it's here, it appears in the [Overlook](#).

信念

2020 年 6 月，蒲公英中学校长郑洪因为疫情滞留在了美国。中考那几天，身处大洋彼岸的郑洪内心很是焦灼。2019 年，学校有 85% 的孩子考上了高中，是建校 14 年来的最好成绩。但时隔一年，郑洪特别没有信心。

2019–2020 年下半学年的教学，被疫情冲得七零八落。线上教学对一般学校难，对蒲公英中学更难。有的家庭没有网络，也用不起流量。有的孩子是在别人的饭馆旁边，蹲在墙根蹭网上课。有的家庭有两三个孩子，但是只有一部手机。学校有些藏族学生，寒假回家后就无法再返京了。上网课的时候，他们正在放

牧，即使带上手机也没有信号。更普遍的情况是，「课堂上」经常有学生突然就消失了，等他们再回来，说是网断了。

即使是正常上着课，老师们也很焦心。「你从镜头里多多少少能看到他们身处的环境，他们是没办法有一个安静的学习氛围的。」老师范芳芳告诉我，「往往是孩子上着课，这边有人在吃饭，那边有人在洗衣服。」

令校长郑洪更担忧的是：脱离了学校的环境和老师的密切关注，初三的孩子是不是还有动力完成最后的蜕变和冲刺？

蒲公英中学的孩子基础差。学校每年对初一新生进行入学学业基础评估，孩子们的水平普遍停留在小学三年级到四年级上学期。语文、数学、英语三门能够及格的学生经常是个位数，有时候甚至「全军覆没」。不少人英文 26 个字母只认得一半。多年的经验证明，孩子们在学校三年的成长是厚积薄发。很多学生，尤其是男孩子，往往到了最后一个学期才「觉悟」，在学业上奋起直追。

考试前，郑洪录了一段话，做最后的总动员。她提醒学生，老师们在这特殊的学期里所做的种种努力：学校所有的教研组长都加入到初三教学，连艺术组的老师也不肯袖手旁观，主动要求参与到学生的学习小组里去……「老师们这么做，是相信你们，相信你们的潜力，相信你们的决心。」录音里，郑洪言辞恳切：「在此之前，你们的父母亲人带你们走南闯北，为你们撑起一片天。而中考，去冲锋的是你们自己。中考的意义重大，中考使我们取得继续求学的资格，使我们取得相信自己的勇气，带着这份勇气，我们第一次全权负责，走出自己的路，创造自己的未来……做最好的自己，这人生的第一关你们要冲过去。」

2020 年夏天，北京遭遇酷暑。中考那几天，身处大洋彼岸的郑洪总抑制不住去想她的学生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有一天上午的考试 10 点 30 分就结束了。她心里着急：下午开考前的这段时间里，蒲公英的孩子能去哪儿？公立学校的北京本地孩子们没有这些问题：家长的车也许就在考场门口等着；家住得远的，可能直接就去附近的酒店休息。蒲公英的孩子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的午饭会去哪里吃？晌午烈日当头的时候能去哪里避暑？就算可以回家，那家里也是一样的热呀！「我就想，这半年的种种困难之下，这些孩子能斗志昂扬地完成三天的考试吗？头一天如果考砸了，会不会第二天就不去了？」

最后的考试结果让郑洪感到宽慰。2020 年，蒲公英有 125 名毕业生，124 人继续求学，其中 99 个孩子上了高中。后来，郑洪和别人谈起这场有惊无险的考验，对方说的一句话一下子击中了她的心：「这些孩子是有信念感的。」郑洪很喜欢「信念感」这个词，「它说明学校在学生身上，下了两年的功夫没有白费」。

2005 年春季，郑洪牵头和一批知识女性募捐集资，在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寿宝庄租下了一个废弃的开关厂厂房，建起了北京第一所面对流动儿童的公益性、非营利性中学。办学校的念头来得很单纯。郑洪在美国工作生活了多年，对公益慈善文化深感兴趣。49 岁那年，她干脆跑到哈佛大学攻读了公共管理学硕士，专门研究非营利组织。人生已过半百，光阴不等人，既然学了，就要学以致用，大干一场。

时值北京筹办奥运会，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大量农民工涌入首都。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成了当时颇受关注的现实问题。据北京市教委的统计数据，蒲公英筹建的 2005-2006 年间，北京市有近 40 万农民工子女，对

应这些家庭的教育需求，北京出现了约 350 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可郑洪调查发现，这些学校都是小学，办中学需要有实验室等配套设施，建设投入相对更大，没人愿意做。

「让孩子接受教育是永远错不了的，而且不管最后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做一定比不做好。」抱着这样的想法，14 名老师和 120 名学生在 2005 年秋季迎来了蒲公英的第一次开学。

建学校的初衷只是为了让孩子有学上。郑洪想得很简单，办学校无非是教课，只要找到科任老师就好，实在不行就自己上。可教学一展开，她就发现根本不是「喊完上课、起立，就开始教」的事。学生的基础差还不是让老师们最闹心的。刚开学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突发事件发生，打架的、闹事的、出走的。有个班级被称为「大闹天宫班」，曾经在一个月內气走了三位班主任。就在今年的毕业典礼上，郑洪还跟孩子们提道：「年轻老师流的眼泪能把你们的脸盆装满。」

从那时候开始，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摆在了郑洪面前：蒲公英的办学目标是什么？「必须想清楚，你得告诉老师，这还关系到怎么和学生沟通，他们怎么给自己定位。」

这些年，郑洪总是听到两种说法。有人说，这些孩子都落在社会底层了，基础又这么差，咱们就别不实事求是了，成才算了，就成人吧，别成为社会的危害就行；还有人说，这些孩子以后适合接受职业教育。这些人可能各有道理，但是郑洪心里是不服气的。2021 年初冬，我来到蒲公英的时候，学校已经正式把「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合一」设立为办学理念。「这是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悟出来的一句话。」

如何理解「优质」？评价学校教育的成果，社会的评价标准可能非常简单直接。除了学业成绩提高幅度大，进入高中的学生比例高，蒲公英的社会知名度还来源于一些典型：学校 3000 多名毕业生里，有十几个孩子考进了世界联合学院（United World Colleges，简称 UWC）。这是家 1962 年创立的全球性教育组织，历任主席包括蒙巴顿将军、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现任主席是约旦王后努尔·侯赛因。UWC 在世界各地拥有 18 所院校，教授国际文凭大学预科（IBDP）课程，选拔流程和要求都非常严格。一些蒲公英的孩子最终进入了欧美知名高校接受教育。曾经广受媒体瞩目的一件事是，2019 年，蒲公英毕业生段孟宇拿到了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我第一次见到段孟宇是在蒲公英中学新校园的教师办公室里。这个身量单薄、打扮质朴的女孩正站在办公桌前备课。2021 年夏天，段孟宇从哈佛教育学院研究生毕业，专业方向是教育政策。8 月，她回到蒲公英成了一名普通老师，计划工作两年后再申请博士研究生。在蒲公英中学，她是我采访的第一个人。我怀揣着一种期望，想从这个备受瞩目的「逆袭」故事里找到这所学校的力量所在。

如果单拎出一条时间线，段孟宇的经历无疑经典地诠释了「教育改变命运」。她出生在河南周口一个不足 200 户人家的村庄里。2004 年左右，父母到北京打工，孟宇和弟弟留守在家乡，由爷爷奶奶抚养，在村庄的小学里读书。2006 年，父母把姐弟俩接到了北京，在民办学校读小学。

2008 年，在大兴务农种菜的小姨带来了一个消息：大兴这边有一所中学招农民工子弟，学费非常便宜，学校也好。于是，段孟宇走向了人生的「转折点」。从此，这个女孩的路越走越远。初中毕业后，她通过了 UWC 的考核，一下子跨出了国门，在 2012 年 9 月到 UWC 英国校区读高中。2014 年，段孟宇转战大西洋

彼岸，在美国路德学院念本科。毕业后，她从爱荷华州搬到波士顿，一边工作一边申请研究生学习，最终被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录取。

孟宇和我说这些经历时，语言和她的外表一样质朴。这条不寻常的道路确实艰难，但也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并没有那么多峰回路转和高光时刻。我的好奇是，回顾这条漫长的旅程，蒲公英的价值是什么？

孟宇告诉我，有两位老师给她的影响很大。初一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宋凌波对全班要求很严格，帮助她养成了对自己严格要求和自我管理的好习惯。初三的班主任陈卫华曾经在周末坐了好几趟公交车到她家做家访，陈老师还跟学生分享她从新疆老家通过高考来北京读大学的故事，这让孟宇相信，教育可以把自己带到想去的远方。

更多的时候，她讲到的是学校提供的种种支持。孟宇的父母当时在海淀卖麻辣烫和煎饼，晚上出摊。在来蒲公英之前，放学回家最让她发愁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好好写作业。一是时间没有保证，总免不了给父母搭把手；二是没有空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住着四个人，放着两张床，一张堆满了东西的餐桌。父母出摊后，孟宇总是先把家里收拾一遍，把桌上的东西都挪开。可第二天，一家人正常生活的时候，这些东西又不得被挪回来。挪来挪去，演变成了一场令人泄气的消耗战。有一回，爸爸还因此对她发了脾气。来蒲公英后，孟宇欣喜地发现学校提供住宿，虽然厂房改建的学生宿舍条件艰苦，没有良好的采光和通风，夏天洗澡、冬天取暖都是问题，但她非常知足，她太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有序的生活了。

在蒲公英的三年，孟宇印象最深刻的节点是毕业前后，那段时间让这个成绩名列前茅的孩子陷入了巨大的迷茫之中。当时蒲公英引入了青年发展基金一个叫「城市之蝠」的项目，给初三的孩子们开了一门课，希望帮助他们认识未来的出路，有所准备。在这门课上，一门心思考学的孟宇震惊地获知，原来自己是没有资格在北京读普通高中的。一个问题在她的脑海里不停地盘旋：中考以后怎么办？

初三快毕业时，蒲公英毕业生张天歌考上了挪威世界联合学院。孟宇在校园新闻橱窗前站了很久，一遍又一遍地看学姐面试 UWC 时的照片和照片下面的文字描述，内心充满了向往。她心里想到了两条路：留在北京爸妈身边，跟熟悉的同学去职业学校读高中课程，然后尝试考 UWC；或者回老家踏踏实实读普通高中，通过高考这条路去读大学。但是做选择并不容易：去职业学校，万一考不上 UWC，高二之后再回老家读高中准备高考岂不是晚了吗？可如果老老实实回老家备战高考，放弃考 UWC 的机会，她心里又有些不甘心。

孟宇的爸妈不太理解，为什么初三毕业的暑假，女儿还整天往学校跑。蒲公英每年夏天都举办夏令营。这一年，一个小组的主题正好设定在了孟宇的心坎上——「next step」（下一步）。斯坦福、哈佛、北大、清华的志愿者组织了很多活动让学生们体验不同的出路，比如学习写简历、去大公司参观、访谈成功人士、用 500 元实现一个创业想法，还有志愿者给孩子们上了一些高中的课程，让他们体验一下高中学习的感觉是什么。

这个夏令营让孟宇打开了眼界，也让她有更多时间思考未来的目标。她和一位北大志愿者姐姐成了亲密的朋友。这位志愿者非常鼓励她留在北京，然后报考 UWC，这让孟宇备受鼓舞。

孟宇很幸运。就在她决定去职校之后，蒲公英中学和北京一所私立高中达成了合作协议，对方同意给蒲公英毕业生安排一个整班。即使在就读高中的时候，蒲公英也没有远离孟宇。学校有专门的老师负责了解大家在高中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高中每两周放假一次，这时候，大家就会坐车回蒲公英，学校安排了外籍志愿者，帮助他们补习英语。他们还可以继续从图书馆借阅图书。

孟宇和那位北大志愿者的结缘一直没有中断。自初中毕业后，她的人生道路就已经完全超出了父母的认识范围和想象，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对女儿的困惑给予指导。无论是在高中遇到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还是初到英国在 UWC 学习的艰难适应期，这位志愿者一直在倾听、陪伴和鼓励着孟宇。

在蒲公英采访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我常常感慨蒲公英给学生的「资源」太好了，但这些资源和硬件没有太大关系。

2018 年，学校从旧厂房搬到了社会捐资建设的新校址。即使如此，新大楼和「精致」二字也搭不上关系。蒲公英的办学经费 85% 来自社会捐赠。学校从来不宽裕，每个时期，钱都得用在刀刃上。新校址已使用了三年，我去的时候，学校刚刚得到一笔捐款，开始改造操场的水泥地面。但论教育的软件资源，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蒲公英在许多方面并不比那些知名的公立中学差。请来的志愿者除了国际和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还有各行各业的专家和精英。小说《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以后，作家郝景芳曾经在蒲公英的夏令营开过故事创作课。这个学期，北京八中素质班的元老教师程念祖，每周四都到学校工作一整天，帮助老师们备课。

学生日常也有大量的机会走出去，免费参观博物馆，观看演出，走访一流的企业……老师们的心气很高。一天中午，我在食堂和老师们一起吃饭，美术老师裴广蕊周末刚刚带着她的美术小组去参观了一位版画艺术家的工作室，她兴奋地和校长聊起来：「人家不愧是专业的，每个步骤都像教科书一样。我以前看过很多人做版画，都不规范。咱们学生要学，就得向最好的学！」

大量优质资源的注入是否就是蒲公英中学的「秘密」？我一度这样以为，孟宇的经历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我总觉得似乎缺乏某种说服力。在和学校教师们交谈的时候，他们很少提到那些成绩优秀的学生。有两次我提出这个问题，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笑了笑：好学生是不需要我们教的。

我意识到，和蒲公英的很多孩子相比，总是被媒体作为典型的段孟宇其实是非常特殊的。很多老师告诉我，如果说蒲公英孩子和城市孩子在教育问题上有什么大的区别，那就是他们的家庭对他们的关注和期待普遍是不够的；甚至，有相当多的孩子家庭并不完整，家庭关系存在较大的问题。

这些情况没有发生在段孟宇身上。在孟宇小时候，重男轻女的观念在农村还普遍存在。小孟宇曾经和奶奶提到过这件事，她还记得奶奶当时回答她：我可没有，你出生的时候我还放炮了呢！作为家里第一个孙女，孟宇从小就得到了特别的宠爱。「这种宠爱不是物质上的，而是他们对待我、弟弟和表哥们的的方式，让我觉得这些孩子对他们来说都一样重要。」

从自己的父母及长辈身上，孟宇从小就明白了一件事：读书是值得骄傲的。在村里读小学的时候，有天早上起床，她对着镜子一边梳头一边背课文，正好被从屋外进来的奶奶撞见了。孟宇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她觉得非常尴尬，可是她发现，奶奶逢人就会说起这件事，夸她用功。村里当时有一个传统，家里有了喜庆

的事情会给全村人放露天电影。有一次，一家人在院子里吃饭，正好有户人家因为女儿考上了大学在放电影。妈妈对孟宇说：「你要是考上大学，我也给你放！」孟宇的父母都识不了多少字，但他们一直觉得女儿肯读书，那就是件好事。现在，孟宇的妈妈还会问她，打算什么时候申请去读博士。

在蒲公英，我几次看到孟宇，她都站在办公桌前备课。作为新老师，这个学期她教初一年级的历史。有一次，我问她，当老师的感觉和你想象中的一样吗？一贯很平静的孟宇突然有一点激动：「那可大不一样了！」

孟宇告诉我，学校刚刚结束了期中考试。年级里历史考得最好的孩子在她班上，可这并不能带给她丝毫的成就感。正好相反，这个孩子的优秀和全班整体水平形成的鲜明对比，反而在提醒孟宇，她作为老师的无能为力：「这个孩子的好，绝对不是因为我教得好。」

考试的结果让孟宇在过去一两周里倍感焦虑。事实上，在回到蒲公英的这几个月里，挫败感一直伴随着她。孟宇说，刚回学校的时候，她意气风发，满脑子想的是「把我学到的最先进的、最有创新性的教学理念带到学校来」。

她很快发现，自己遭遇了严重的「水土不服」。比方说，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零点计划」（Project Zero）有一套思维培养的方法，简单可以归纳为思考（Think）- 提出疑惑（Puzzle）- 探索（Explore）。孟宇想把它应用在自己的历史课堂上，让大家先思考，再讨论，然后分享。可现实是，在「思考」阶段，学生们就开始走神了，等到讨论的时候往往一无所获。后来她意识到，这套方法应用的前提，是学生对现有的材料已经非常熟悉了，可她的学生来到课堂的时候毫无准备，就是一张白纸。

站在讲台上的感觉和当年自己坐在课桌前的感觉是如此不同。过去，好学生孟宇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专心致志地追求进步。现在，她必须面对现实：这个课堂里更多的学生不是段孟宇，他们会捣乱，会对学习没有一丝一毫的动力和兴趣。在课堂上，段孟宇遭遇了很多「崩溃瞬间」。最近的一次是，她在课前几分钟设立了一个时事分享环节，让学生轮流讲讲最近读到的一则新闻，或者刷视频看到的一件新鲜事。她觉得这个作业已经足够简单了，结果，一个学生讲的是他周末如何约着同学一起玩，另一个学生说他在回老家的路上遇到了堵车。那一刻，段孟宇觉得无措，她不知道他们是真的不理解「时事」这个词的意思，还是仅仅在和自己开玩笑。虽然同样出身于「流动儿童」，但是这个标签，并不能让她天然地理解他们。

这些挫败感演变成了心态上的一个巨大挑战。今年，蒲公英合并了一所小学的二、三年级。刚回学校的时候，段孟宇在食堂吃饭时和一位老师攀谈起来，得知这位老师教小学，孟宇感慨地说：「小学生很可爱啊。」这位老师意味深长地回答：「你教了他们，就不觉得了。」当时孟宇很诧异，现在她觉得有一点能理解了。她知道老师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可怎么能够做到，她有许多疑惑。过去，她并不觉得教学应该为应试服务，可是真当了老师，她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在乎分数了。「你会觉得那是你工作的成果和证明。」最近她有一种感觉，因为迫切地想在期末让学生的成绩有所提高，她变了，变成了一个特别依赖课本的老师，一个自己特别不喜欢的老师。

这样做是对的吗？她自己也深感怀疑。几天前，孟宇请老教师秦颖去听自己的课，给提提建议。她沮丧地告诉秦颖，她感到现在设计的课程让自己都觉得很无聊。她记得秦老师叮嘱她：「不要老按照课本讲，还

是要注重历史学科本身，把它尽量设计得有趣。」还有一句话：「不要将眼光放得那么短。」



Featured in *Lifeweek*, December 6, 2021. Before it's here, it appears in the [Overlook](#).

渴望

孟宇很坦率地告诉我，她现在还参不透这句话的意思。「不要将眼光放得那么短。」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简单。三年的时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孟宇的「着急」我是能体会的。我曾经去过北京好几所公立中学，采访过不少老师、家长，与他们相比，与最后取得的学业成绩相比，蒲公英的氛围未免太「不着急」了。

学校的教室内、走廊里有很多展示区域，我几乎看不到和科目、考试直接相关的东西。从日常安排看，学校每天下午有半小时的自由阅读时间，每学期有 30-40 个兴趣小组。好几位老师兴致勃勃地跟我提到，这学期学校有一个新的安排，每周五下午拿出一个半小时做「研究性学习」。全校学生自由选择，分成了近 70 个课题组。负责统筹的秦颖老师给我发来了一张课题列表，她告诉我，学校先让学生自己提出感兴趣的问题，老师们在此基础上讨论哪些值得做，最终形成了这样的安排。

很显然，这些课题里，有很多和「拿分」没有任何关系。比如：初一一个小组在做「蒲公英学生毕业后升学情况研究」，还有一个小组在研究唐宋元明清男性女性服饰的演变；初二的孩子对「首都美食」「学校附近的路口红绿灯时间设置是否合理」「重新平行分班与分层分班的优缺点」等感兴趣；进入中考冲刺的初三年级没有搞特殊化，他们的课题包括「什么样的课最受欢迎」「书法艺术在环境中的应用」「蒲公英中学九年级学生的审美趋势」等。

教学楼的几面墙上有研究性学习小组的阶段性成果展示，我终于在上面看到了「英语」两个彩笔描出的大字，可仔细看上面的内容，一个孩子写道：「在古埃及，A 表示『牛头』，B 表示『家』或『院子』，C 表示『曲尺』……」另一个孩子画了一张图表，告诉大家，英语字母的来源是古埃及象形文字，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古埃及人就开始用文字表达神、人、动物，进而表达自然界的山、河，然后是装饰品、武器、农具。

蒲公英的课堂给人最直观的印象是「放松」。学生们很放松，他们七嘴八舌地回答老师的问题，或者走神聊天、插科打诨，老师并不会因此大发雷霆，于是教室里永远没有安静下来的那一刻。志愿者蔺熠在学校教历史，我听他给初一孩子讲秦始皇统一中国。他让所有的学生分成小组围坐在一起。课刚开始不久，离我最近的一个小组里，一个男孩插嘴问：老师，秦始皇的墓找到了吗？接下来，小组里的几个孩子兴致勃勃地小声讨论起来，直到「吴邪」「张起灵」这些词飘进了我的耳朵里，我才发现，我就座的空课桌上放着一本《盗墓笔记》。

老师好像也放松得很。历史课堂上的这些讨论并没有被蔺熠厉声制止。下课的时候，蔺熠也没有布置练习题，虽然两周后就会迎来期中考试。老师李时来在初一年级教道德与法治课。上节课讲到友谊，她让学生课后拿着设计好的问卷做一个采访。可是课堂上一问，孩子们几乎都没有完成作业。她倒是不急不恼，干脆把孩子们撒出去在学校找人采访。

有时候，作为一个纯粹的旁观者，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有点着急，甚至片刻还有挺身而出整肃纪律的冲动。可两位老师都告诉我，孩子们平时很活跃，今天因为有我旁听，他们的表现比平时还克制了一些。

李时来到学校 5 年多了，她告诉我，如果是以前，遇到同样的情况她也会发火的。蔺熠在学校志愿服务多年，这个学期是他第一次全面承担课程。他对课堂有不少自己的设计，比如整节课由一连串的问题组成，每个问题提出来都要求学生迅速阅读课文，然后每个小组派一名学生到黑板上书写答案。这些答案，蔺熠

并不检查——他这么做并不是要正确答案，而是锻炼学生快速阅读和提炼内容的能力。他虽然不布置练习题，但每周有一个小作业：学生要画一条时间轴，把这一周生活中值得记录的事情和感受标注在这条轴上。蔺熠对我说，他学历史有一个体会，时空观的建立非常关键，他希望用这种方式帮学生建立对时间的理解。

这些训练显然没有立竿见影的成果。蔺熠心里其实也打过鼓。就在期中考试前两周，他问校长郑洪：按我这个教法，考试成绩肯定不好看，怎么办？校长给蔺熠吃了颗定心丸：「你就按你的想法来，你的任务就是让他们对历史产生兴趣，考分的事儿还有初三呢。刷题一年足够了，不着急！」

我问郑洪，这种不着急的底气从哪儿来？答案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它无涉任何高大上的理论和概念：「因为一般学校刷题、应试的做法在我们这里行不通呀。我们的孩子基础那么差，到这里的时候厌学情绪已经很严重了。你一刷题，别说有成果，学都不来上了。你要想对他们负责，你就不得不想别的办法。」

在办蒲公英中学以前，郑洪没有接触过基础教育行业，怎么办学校，是一步步在实践里摸索出来，从一届又一届学生身上学来的。她记得有一年，她要求学生写一篇文章，主题是「渴望」。她的初衷是想听听孩子们内心的想法，于是说：「字数不限，也不用管错别字，随便写。」平时，写作文是孩子们的老大难问题，但那一次，学生们写个不停。一个孩子写了满满 11 页稿纸，下课铃声响了，该吃午饭了，他也放不下笔。这个孩子写了他在家乡留守时的状况，被接到父母身边又遇到了什么坎儿。他说，他见不到爸爸妈妈的时候特别渴望见到，见到他们后的生活又和他想象的不一样，父母依旧忙碌，没空陪伴自己，而在这个城市里，他又失去了过去的朋友。

郑洪说，哪怕不考虑这些文章里的内容，这件事也可以教育她一辈子：出作文题得出在学生的心坎上，教育的任何细节都一样。这些年她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只要你肯想办法去贴近学生、了解学生，去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你就会贴近教育的基本道理。」

孩子们最迫切的需求是什么？你很难从他们的表面一眼看出来。艺术家叶蕾蕾第一次来学校，学生的笑声和活力让她一开始认为他们就是快乐的。后来她观察孩子画画和写作，发现他们会表现出与年龄不相仿的成熟、理智，以及令人警惕的不良情绪。有一次，她让学生们以图画方式描述自己的出身。一个同学画了一棵枝干被折断、残缺不全的树，在这棵树下有这样一句话：「我就像这棵树，被风吹折了，变得残缺了。」另一个同学把自己画成飘落的叶子，她这样描述自己：「我就像这些叶子从树上掉落，没有根也没有方向。」还有一幅画是一个小女孩跪在地上，举起双手紧握在一起，满脸是泪，她在乞求父母要对她有耐心、理解她。

蒲公英对学校环境的建设有一种「执念」，这种建设，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美、精致。第一次见到郑洪的时候，她和我提到，现在的新校园还远远没有达到她理想的状态，还有很多空墙，「不敢轻举妄动，要有很好的构思去把它们做出来」。去年夏天，郑洪从美国回国，在上海隔离时，看到三联人文城市奖颁给了「四叶草堂」社区花园。隔离期一结束，她就拖着旅行箱去参观，想看看设计者如何让小花园激活了社区的公共生活。

我后来慢慢理解了这种「执念」。学校创办之初，去孩子家做家访，老师们常被家庭居住环境的简陋所震惊。这些家庭普遍居住在一间 10-20 平方米的房间内，有的家庭就住在搭建在菜地或猪圈旁边的四处漏风

的棚子里。老师们很难把它们和安身之地、「家」联系在一起。对于绝大多数孩子来说，他们也都没有一个可供自己支配的空间。老师还曾让孩子们去描述他们眼里的北京，得到的答案是：脏、臭，没有绿色。

老师们想，学校的教育功能是从哪儿开始的？它不是从打了上课铃，也不是从种种训诫措施开始。当学生们从街道上走进校园时，甚至一清早想到要去学校时，其实就已经受到了情绪的影响，他们迫切地需要一个温馨、有归属感的校园。

我在教师办公室里看到了一个纸糊的旧校园桌面模型，是老师和学生一起动手制作的。学校里还有一两块旧门板，一位老师告诉我，那是从旧校园拆下来的，舍不得扔掉。已经拆迁的旧校址是一个故土般的存在，并不只因为它是蒲公英的起点。

2007 年，从西安美术学院毕业的裴广蕊入职蒲公英中学任美术老师。她告诉我，那个简陋的校园之所以留住了她，一是因为学校有一间图书馆，二是因为有一间专门的美术教室，三是恰逢艺术家叶蕾蕾到学校做环境改造。

叶蕾蕾是郑洪从美国邀请来的。1986 年，叶蕾蕾在美国费城大学执教。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她结识了一位舞蹈家，对方知道她做室内花园设计，邀请她在自己工作室旁边的公共空地上设计建造一个小花园。叶蕾蕾一口答应下来。等到她真的从政府申请到了一笔钱做这项工程的时候，她才发现难点所在：这个空间比想象中大多，钱根本不够用。一位专家指点她，这件事不能做，不仅因为没钱，还因为她是这个社区的外人，那里的孩子会把她的室外作品毁掉。

专家的担忧不无道理，这块公共空地位于费城北部臭名昭著的贫民区。但叶蕾蕾从争取社区居民的支持，发动当地的孩子开始，一口气干了 18 年，一共建了 17 座园林，整理了 200 多块公园绿地，完全开放给大众。很多建设是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和灵感完成的。叶蕾蕾的一位合作伙伴从前贩过毒，也吸过毒，他在 16 年的时间里执行完成了很多激动人心的马赛克镶嵌作品，他手下的 4 个助手都是当地人，都没有上过艺术学校。

因为这次环境改造，一连串的变化发生了。叶蕾蕾的团队和学校合作，组织本土戏剧创作，而后给孩子们办周末和暑期学校。孩子们参与进来后，也会吸引成年人。这个项目逐步发展成为非营利性组织，取名为「怡乐村」。一个肮脏、充斥着毒品和被人遗忘的角落，变成了一个全美知名、生机勃勃的社区。

叶蕾蕾相信，艺术不仅可以表达自己、以此为生，也能够实实在在地改造社会，重建人心。这个观点深深地打动了郑洪。

旧厂房改造的学校，大多数建筑的表面被水泥包裹着，灰色的环境映衬着灰色的天空。叶蕾蕾决定在这些墙壁上做文章。但这件事并不全由她来完成，她发动学生描述自己想在校园里看到的東西，并尝试自己动手画画。蒲公英旧校园有很多墙壁和圆柱装饰了马赛克镶嵌画，它们也是由学生和老师共同完成的。学生动手把老师们从批发市场购买的瓷片砸碎，他们还带着老师们翻过一座围墙，来到一个荒芜的工地，把埋在废墟里的瓷片瓦块拣出来运回校园。当孩子们把这些瓷片分开洗干净的时候，他们发现，购买来的瓷片很光滑，色彩单调乏味，而那些拣来的瓷片，厚薄不一，形状也各不相同。一些釉面光亮，一些印有图形，还有一些甚至用金色涂过，这都令他们感到由衷的兴奋。

面向校园大门的教学楼是校园里最重要的建筑物。这个两层的楼房像个白色的长方形盒子，外墙漆已经脱落，破落、斑驳。叶蕾蕾问学生们，希望看到什么？一个孩子在她的工作坊里把一个大大的彩虹画在了整栋楼上。于是，叶蕾蕾决定实现它。想要画彩虹，得在二层楼高、60米长的屋顶边缘建造一个弧形的架构装饰，为此，年过六旬的叶蕾蕾一次又一次地爬上脚手架。学生们也没有袖手旁观，他们排成单列队，从楼下沿着楼梯一直排到房顶，一块一块地把砖递上去。

第一次画彩虹的时候，叶蕾蕾错误地估计了它的尺寸。她站在脚手架上，觉得彩虹非常不错，可学生们从地面上看，彩虹就像一条丝带，很不起眼。一个孩子马上评价说：「太窄了，看起来也不好看，要加宽所有的彩色线条。」叶蕾蕾毫不犹豫地照做了。

10月下旬的一天，太阳钻进了灰蒙蒙的云层里，叶蕾蕾正站在脚手架的顶端，想赶在阳光散尽之前尽快完成工作。她突然听到校园里一阵可爱的歌声响起，伴随着一声大叫，30多个学生一齐呼喊：「叶老师，加油！加油！」

美术老师裴广蕊告诉我，她刚来蒲公英见到叶蕾蕾的时候，其实并不能理解这个艺术家做的事，这和她从美术学院学到的那些殿堂之上的艺术太不一样了。改造结束的时候，她感受到了某种力量，觉得像是做了一个梦。但对于学生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她并不敢断言。多年以后，学校就要搬往新校区了，裴广蕊突然意识到了那颗埋在心里的种子：那是一砖一瓦承载的真切的情感和记忆。她心想：「新校区的条件再好，可那里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在蒲公英的新校园里转了一圈，我注意到，每个班的外墙上都有一幅手绘的中国地图。班里的孩子把自己的家乡在上面标注出来，然后再贴上自己的照片。后来我得知，几年前，蒲公英推出了一个校本课程，名为「成长」，这个地图是其中一个主题的成果之一。这个主题叫「爱生课堂」，组织学生建设和管理自己的教室，把对校园环境的改造延伸到教室环境里。

「成长」课是蒲公英的第一个校本课程，之所以开发它，是因为老师们越来越理解在成长过程中，学生们有许许多多未被满足的普遍需求：他们会因为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而情绪低落；他们有理由为出路担忧；他们被青春期的特点左右行为时，会厌学，会记不住单词，解不了方程式……学生们的学习动力和情绪、成熟度、环境的复杂程度搅在一起，又伴随着价值观、世界观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不解决这些问题，教育无从谈起。

「成长」课的第一个主题课程是「认识你自己」。老师们会让学生画一幅自画像，从仔细观察自己的外貌、表情开始，思考自画像背后的「心灵花园」是什么样，认识到自己眼中的「我」和他人眼中的「我」之间的区别，进而学会思考如何认识自己，如何对待真实的自己。

设计这样的课程，首先是基于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心理特点。跨入青春期，孩子的自我感在膨胀。在成人世界的参照下，「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干什么」等问题会愈来愈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中。实现自我同一性，明确自己做事的目标，有收获、成功、胜利的幸福感，是教育者要引导孩子们完成的重要目标。老师们觉得，对于蒲公英的孩子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这些孩子从小没有得到父母应有的陪伴，大多数父母文化水平偏低，教育上或是粗鲁，或是溺爱，或者「放羊」，孩子们缺乏认识和反思自己的机会。

蒲公英中学的校训是：「自信、乐群、求真、创造。」在拟定这个校训的时候，老师们是毫不犹豫地把「自信」放在第一位的。

2005 年，第一批学生入校不久，《中国青年报》「青春热线」创始人陆小娅与学生有过一次沟通。当被问及「你是否觉得自己很重要」时，一个班 30 多名学生里只有三四个孩子举了手。「怎么知道的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我。」「因为奶奶爱我。」大多数孩子对陆老师的问题不置可否，表情漠然。

孩子们之所以来到北京，多数是因为在老家生活难以为继。在城市里，父母有谋生的压力，家庭居无定所，孩子求学碰壁。这一路步履维艰，不乏遭遇拒绝和排斥的经历。这些都在影响孩子的自我评价，让他们不相信自己存在的意义。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老师们总觉得孩子们灰头土脸的，这不仅指外表，更指心境。

可是自信怎么建立呢？有时候，老师们和志愿者会领着孩子们在校园里喊口号。大家排着队，一边行进一边高喊：「我最棒。」孩子们很兴奋，声音洪亮真诚，但老师们不得不想，回到艰辛的日复一日的现实中，孩子们怎么相信「我最棒」呢？如何让孩子们尊严来守卫他们？

「什么是自信？自信能与生俱有吗？能失去又被重建吗？人生需要经历什么，自信才能成为真实的、属于一个具体的人的不离不弃的个性特征呢？」也许，世界上并不存在一门课程能够全部解答这些艰深的问题，但至少可以迈出第一步。

老师们决定从孩子们自身的经验出发。在名叫「我的身路历程」主题课上，老师给孩子们每人一张中国地图，让他们用彩色铅笔把自己的家乡、自己跟随父母走过的地方都画出来，让他们回忆在这些地点，自己对什么样的经历和感觉记忆最深刻，再用色彩和图形把自己的感受和记忆描绘下来。

课堂上，大家会一起分享自己的创作和背后的故事。当这些个体的故事被表达、呈现、分享的时候，在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能够逐渐看清几件事：流动的生活并不只是一个人的遭遇；这是一个阶段的社会状态，遇到难处并不是因为学生家庭的无能和错误。他们还发现，即使生活艰辛，也会有亲情、友谊和社会的关注。

孩子们很享受这样的过程。郑洪记得，最早尝试这门课程的时候，孩子们一开始很茫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可当老师开始发 12 色彩色铅笔的时候，学生们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一个男孩握着铅笔从教室这头儿跑到那头儿，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我有这么多颜色的铅笔！」

大部分孩子会向老师要更多的白纸，贴在自己的图画周围，用更多文字和图画表达自己。还有人会情不自禁地写诗。他们喜欢五颜六色，喜欢描述快乐和亲情。孩子们在分享彼此作品时，会一起哭，一起笑。老师们发现，他们有能力处理哀伤，从心底里愿意拥抱希望。整个过程下来，学生们的情绪明显变得更轻松，他们之间的互动也更亲密了。

蒲公英 85% 的办学经费来自社会捐助。学校平均每年接受社会各界的爱心捐赠约 260 次，长期志愿服务的团体约 12 个，每年大约有 3460 人次参与志愿服务，服务总时数近 2.5 万小时。

走在学校里，这些信息无处不在。学校会公布近期的捐助，设有专门的感恩室，展示学校历史上受到的帮助，甚至每间教室的门上都写有捐助者的姓名和他们的寄语。「感恩」是蒲公英「成长」课占比最大的部分。在毕业典礼上，郑洪经常对孩子们强调两句话：「相信潜力」；「保持善意」。

我心里有个疑问，如果孩子们生活的环境时刻向他们强调，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要靠别人的援手，会不会有让他们感到自身无力和卑微的危险？自信和尊严如何实现？

郑洪说，她从孩子们身上学到的一课，就是他们多么看重自己的尊严。有一个孩子的父母在新发地市场工作。他们受雇于市场里的摊主，半夜就去上工，把蔬菜收拾干净，整理包装好，赚的是最微薄、最辛苦的钱。一次郑洪带这个孩子出去参加活动，有人问孩子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孩子用他能想到的最体面的方式回答：「蔬菜包装。」

还有一个女孩，她事实上已经被父母抛弃了。郑洪很坦率地告诉我，她选这个女孩去参加募捐活动，潜意识里有一些期望，她会向捐助方提到父母不在身边，自己很需要帮助。可是当有人真的问起女孩的情况时，郑洪听到女孩答道：我是跟我爸爸妈妈一起来北京的。

郑洪说，这些事情，让她做什么都会掂量掂量。学校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一些媒体和捐助方希望孩子讲自己遭遇的悲惨故事，最后学校把这些活动叫停了：「把学生的形象弄成可怜兮兮的样子，用这种可怜去换钱，那咱们宁可不要。」

郑洪希望捐助者和志愿者也能懂这一点。令志愿者赵莎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郭氏基金在嘉里大酒店办慈善晚宴，给蒲公英中学募捐。根据安排，晚宴的时候，蒲公英的合唱队要在宴会厅外面唱圣诞歌曲。赵莎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类似的募捐形式在国外很常见，但是主办方还是觉得这种安排不妥。后来，晚宴之前，主办方派了一辆卡车到学校，里面装着当天宴会厅要使用的圆桌、椅子、桌布、酒杯、碗碟、银餐具和食物。他们在学校找了一间比较大的教室，铺好桌布，摆好餐具，当天晚上宴会的领班带着三个服务员把合唱队的孩子们一一请进去就座用餐。

郑洪告诉我，学校进行感恩教育有三部曲：「第一是知晓，你得知道谁帮助你；第二是表达，你得通过一些语言和活动表达感谢；第三是行动。我们强调『日行一善』，并不是说，你长大了、有钱了再做什么。不管你的外在条件如何，你都有能力去帮助别人，都可以分享，都可以贡献。这样你就不是无力的，你是值得被帮助的一个人。」



Featured in *Lifeweek*, December 6, 2021. Before it's here, it appears in the [Overlook](#).

教师的修炼

去年 6 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聚集性新冠疫情暴发。市场距离蒲公英中学不太远，学校上午还在上课，下午就接到了学生必须离校、线上教学的通知。孩子们回家后，初一年级班主任、语文老师范芳芳遇到了一个难题：班里的孩子小路（化名）失联了。家校联系簿上的电话始终打不通，家庭地址只有 6 个字：旧宫镇吉庆庄。

范芳芳和另一名老师王健坐公交到吉庆庄站下了车。她隐约记得小路说过，自己家住在部队大院的边上，就顺着这条线索四处打听。机缘巧合，一位大爷蹲在墙根下休息，说他认得这家人。大爷给自己的工友打电话，把孩子的大伯叫了过来。

去小路家的路上，范芳芳明白了家校联系簿上的地址为何语焉不详。「我们绕过一座公园，穿过一片刚打完地基的待建工地。工地尽头的大路被封堵了，边上有条小道，又走了一会儿才看见一间平房。」范芳芳有点恍惚，她是在农村长大的，田间地头常有类似的破落房子，用于存放灌溉农田的器具，俗称「井房」。

很快，另一个疑问也得到了解答。为什么电话打不通？因为这间「井房」既不通电，也不通水。周围的住户都已经拆迁搬走了，小路一家的日常水电消耗全靠附近部队大院的门房行个方便。

小路的大伯说，他们老家在河南，小路父母皆有重病在身。为筹钱治病，家里的宅基地已经卖了出去。小路的哥哥留守在老家，大伯和大娘带着这个最小的孩子来北京谋个出路。大娘年纪大了，只会讲家乡话，在北京找不到活计，三个人过日子全靠年过六旬的大伯收废品、扛货物、在工地干零活儿挣钱。

小路是个寡言、不善表达的孩子，但范芳芳这天的所见所闻让她听见了沉默背后的许多言语。范芳芳想起，有一次她让孩子们写作文，讲难忘的一件事，小路写道，他深深怀念暑假的时候回老家，和哥哥一起玩耍的短暂时光。那时候，范芳芳还没有完全读懂里面的孤独。站在这个「家」里，她想，周围没有一户人家，小路是多么缺少玩伴啊。她还想起小路特别喜欢地理，常常在纸上画地图、城池，设立规则，创造自己的小世界。现在，她看到了这个特殊爱好背后的渴望和无奈：这是一个孩子无法像同龄人一样享受电子游戏乐趣时的自我补偿。

出发前，老师们考虑到种种可能，从学校给孩子带了一部手机和一个移动充电器，但没想到的是，为了给小路上课，大伯已经去办了话费换手机业务，专门给孩子准备了一部手机，只是电用完后并不总能充上，一家人也不清楚该怎么使用软件。这部手机的代价是一个月 80 块钱的基础话费。范芳芳替一家人心疼这笔钱。小路的大伯说，这不算什么，来蒲公英中学之前，为了让孩子读完小学，他们还曾缴纳过近 1 万元的学费。

北京初夏的下午，屋外，阳光灼人，屋内，一片昏暗。因为缺水，房间里简陋的陈设也并不干净清爽，但这就是一个家。屋外空地上，一只被绳子拴住的小花狗看家护院，冲着不速之客汪汪叫着。一株茁壮的向日葵顶着盛放的花朵，神气地立在大门旁。大娘告诉范芳芳，那是她特意种下的。

这次意外促成了范芳芳的第一次家访。她 2019 年来学校，很快新冠疫情暴发，迫使蒲公英中学中断了延续十多年的传统。学校刚建立的时候，郑洪第一次去学生家，是拜访一户以养猪为生的家庭。7 月的盛夏，一家人住在猪圈边儿的棚子里，被腐烂的气味和黑压压的苍蝇包围着。后来，学校规定每年 9 月份一开学，包括行政及支持部门在内，所有老师都参加地毯式家访。一个学生在校三年，老师必须登门三次。

新生入学的时候，学校初步了解过学生的经济状况。小路一直享受着学费减免。从小路家回来后，范芳芳联系学校，把小路的校服费和餐费一并退了回去。过去，学校每次地毯式家访之后，就会诞生一份「秘密」名单：哪些孩子经济特别困难，哪些孩子身体不好，哪些孩子受家庭的负面影响大……他们都会成为学校重点关注的对象。

很多时候，教育的秘密就在家藏着。蒲公英的学生，缺的不是批评；喋喋不休的说教，「不仅无用，而且反动」。如果不看到学生的心里去，老师磨破嘴皮子也是没用的。郑洪记得多年前一位叫小娟的年轻老

师，她刚到蒲公英工作没多久，班里有个孩子突然躺在宿舍的床上不肯起来，不上课，也不吃饭，怎么问也问不出原因。小娟没有办法，就去了一趟孩子家，这才得知这个孩子没有妈妈，妈妈早年因为家里太穷离家出走了。小娟买了包子，回到学校，拿到这个孩子面前说：「起来吃吧，妈妈看你吃。」这个孩子马上就床上爬了起来，从此跟在她后面叫妈妈。

但我后来理解，家访的意义更多的是老师的自我教育。

老师们家访是揣着一份调查问卷上路的。这份问卷相当于一次社会调研，内容从家长的职业、烦恼、身份认同，到家庭的迁徙史、家庭日常行为习惯、对孩子的期许等等。这些内容会形成一份调研报告。校长郑洪还要求，每个老师都要写家访日志，字数不限，谈感触最深的东西。所有这些数据和文字汇总成册，供大家分享。

家访的所见所闻，往往会给老师们带来巨大的冲击。物理老师秦颖还记得当年大学毕业后为什么一心一意留在了蒲公英工作。秦颖刚入职的时候正逢学校举办夏令营，她接受的是传统的师范教育，看到老师和志愿者们组织的课程形式非常新颖，孩子们学习的时候乐在其中，觉得大开眼界。过了几天，学校组织家访，她去的第一个家庭就住在菜地边上。窝棚里黑漆漆的，只有门口的一点亮光。那个孩子坐在一张小板凳上，靠在门口，就着那一点光学习。这一幕与学校夏令营里的明快画面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秦颖一下子感到了留下当老师的价值感。

郑洪观察到，新老师做家访，感慨的往往是最直观的现象——学生的家里有多穷，家庭状况如何糟糕。一年又一年，老师们的家访经验越丰富，他们从家访里看到的東西就越多，想得越深。

化学教师白云觉得自己每次站在教室里都会有太多的不理解——不理解学生为什么不爱学习，为什么习惯不好。可每次走在家访回来的路上，她内心里都会多一点释然。2018 年家访的时候她发现，2017 年底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发生大火以后，很多家庭不得不搬得更远，有一个女生的家直接搬到了河北。白云发现这个新家没有暖气，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凌乱冷清，锅灶布满灰尘，估计已经好久没有人做饭了。她这才知道，原来女孩周末都是一个人孤零零度过的。女孩的哥哥结婚需要盖房子下聘礼，家长周末为了多挣钱，少花点车费，经常不能回来，偶尔回来一趟，为了弥补内心的亏欠，总要买零食补偿孩子。对于孩子来说，吃上零食就是无比的幸福。白云心想，这是不是孩子们总要违反学校规定，想方设法带零食来学校的原因呢？

班主任、英语教师李牧凌教过一个女孩，漂亮、秀气、皮肤白皙，爱笑，也爱美。她给脚指甲涂了指甲油，把头发编成很多小辫子盘在头上。李牧凌很柔和地提醒了她几次，这样打扮不符合学校的仪容要求。女孩很听话，每天晚上 9 点以后才会给自己做一个漂亮发型，美上一小时。李牧凌心里猜测，女孩应该出生在一个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母亲可能就是一个收拾得很利索、长得很漂亮，也爱打扮的女性。那一年家访，她就是抱着这样的期待去的。

可当她在路边等待了 20 分钟后，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一路响着停在了面前。眼前的这位母亲皮肤黑里透红，显然常年风吹日晒。老师们跟着她走过一条肮脏、拥挤的小街，拐进了一个小胡同。胡同尽头，一道金属板围墙挡住了去路，中间只有一道狭小的缝隙。一行人挤过这条窄缝，越过一段正在施工的路，又钻过一道挡墙，终于来到了一片菜地。孩子的家就在菜地边上。破旧木板搭成的「房子」覆盖着塑料薄膜，勉强

遮挡四壁随处可见的裂缝。出于安全考虑，家里不敢生炉子取暖。母亲指了指一个用来装菜的塑料筐，说那就是孩子周末在家里写作业的「课桌」。她告诉老师们，她希望孩子能把学业提高上去，最近她发现孩子很爱美，请老师严格管教。李牧凌只是点了点头，她突然觉得，对这个小女生的爱美多了一分理解。

还有一个男生，块头儿高大，学习不好，行为习惯也有问题——人称「觉主」——上课随时都有可能睡上一小觉。穿过狭小、脏乱的小胡同，走进他家的时候，李牧凌不由得惊了一下：房间虽小，但收拾得非常干净、整洁，床单上连一个褶皱都没有。男孩的父亲和奶奶告诉李牧凌，孩子在很小的时候被车轧断过一条腿，留下爱犯困的后遗症，有时甚至走在路上也会突然犯困。李牧凌想起一件事，上周男孩回到学校时，手腕处有好多瘀青， he说是周末帮父亲卸货时弄伤的。李牧凌问家长有没有这回事，男孩的父亲说确实如此，他还告诉李牧凌，他上周末回家时发现孩子大腿上有一些青紫的痕迹。孩子说，自己上课犯困，为了让自己不睡着，就掐自己的大腿。奶奶这时插了一句话：「孩子可有孝心了，周末回来有时会跑来看我，路上给我买个馅饼，揣在怀里，说是怕凉了。」李牧凌心里感觉很复杂，她问自己：这个男孩，我们能简单地判断他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吗？

学校「爱心小屋」负责人李时来有一次跟一位班主任老师去女孩露露家做家访。在地铁里，李时来主动和女孩聊起来，她觉得自己能从心理老师的角度给女孩提供一些帮助。露露和李时来说了自己的烦恼：哥哥已经离家出走一年多了，只偶尔和她联系，对父母不闻不问。李时来从专业角度揣测，这是个亲子关系不好、家教很严的家庭，于是头头是道地跟她分析如何做好哥哥与父母之间的桥梁。露露听得很认真，看着她倾听的眼神，李时来心里充满了成就感，觉得又帮助了一个孩子、一个家庭。

露露的家在繁华的商业高楼包裹下的胡同区。转悠了好半天，在一个狭长的小道处，露露终于说到了。进去一看，在垃圾堆的旁边有一间小屋，安装着几乎没法锁上的简易门。露露的母亲在家，她告诉老师们，孩子的父亲已经是癌症晚期，在老家住院，这次她是因为有家访，特地从老家赶回来的。平时的周末，这里只有露露一个人住。身为母亲，她对这种局面无能为力，能做的只是叮嘱女儿睡前在门口放一盆水，万一有人闯进来可以听到动静。母亲说着哽咽起来，露露在旁边听着，依然安静、乖巧。

从家访回来的路上，班主任老师告诉李时来，露露的父亲生病以后，要求儿子承担起养家的责任，露露的哥哥是因为感到承担不了这样的重担才离家出走的。哥哥出走以后，父亲还带病在老家盖房子，以备儿子结婚之用，这才突然导致了疾病的恶化。李时来在地铁里的那些成就感烟消云散，只剩下对自己的自作主张、自以为是的惭愧。她对处在苦难中仍然坚强、安然的女孩感到由衷地敬佩：「我是多么想帮助她、陪伴她，可我如何做才能真正帮到她呢？」

这些对人心的体察和体谅，是郑洪最终希望看到的。蒲公英很多孩子的家都没有门牌号，被家访的家长和学生会和老师约好一个地方碰头，再辗转去家里。郑洪记得，曾有一位老师在家访笔记中写道，她和学生一起坐在平板车上，看着前面蹬车的这个父亲的背影，风迎面吹打在他身上，头发都竖了起来。那一刻，她感到，这是个顶天立地的人。

只要有这一句话，郑洪就相信，老师的家访没有白做，这些，会成为学校教育的底色。

怎么去理解这种「底色」？

张均辉是今年 1 月份刚刚入职蒲公英的新教师。他在西北民族大学学的是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北京的社工机构做了 4 年学校项目，工作主要是和各个公立学校的「问题学生」打交道。他观察自己去过的那些学校，常常会产生种种的疑问和不解。有一次，张均辉所在的社工机构接到一个案例，一所公立中学有一名初二女孩情绪波动很大，经常和老师、同学起冲突。女孩在学校办公室拿起花瓶砸向一名老师，虽然老师没有被砸到，但这件事已经触及了学校的底线。

张均辉和同事前去处理这件事，发现女孩的问题源于她的家庭。孩子的妈妈不在了，爸爸游手好闲，对她几乎没有关怀。女孩只能和爷爷生活在一起。爷爷又对她不理不睬，甚至有一些过分的行为。女孩极度缺爱，于是她就变成了一棵仙人掌，浑身是刺，用攻击别人来自我保护，寻求安全感。学校并不是完全不了解这些情况，但没有人去关注和处理女孩的这些困难；相反，老师已经明确地把她划分成另一类学生，让同学们不要理睬她。学校提出来，可以给女孩直接发一个毕业证，让她直接去上职高。

张均辉记得，他和同事和女孩聊了很久。面对这些愿意倾听自己的人，女孩将自己的种种心事和盘托出。她还说，自己想留在学校读书。张均辉所在的机构给当地教委反馈，建议学校能够更多地理解、关怀这个学生，给她提供必要的帮助。没想到的是，第二天，这所中学的校长就把张均辉他们叫了去。「他说：你们不要当圣母玛利亚，你们不可以扰乱学校的教学秩序，你们的工作是以学校为中心的，以学校的需求为导向的。我们现在就是不想让这个学生留在学校了。学生总是有好有坏，有能上大学的，就有成为阶下囚的。」张均辉向我形容他听到这番话时的心情：「胆战心惊。」

蒲公英中学每周四都有教师研讨会，全体教师一起分享、讨论和解决教学里的种种问题。张均辉好几次听到郑洪强调要做到「一个也不能少」「人人都能引领」，这些话让张均辉很有共鸣。

「一个也不能少」是很多老师进入蒲公英学到的第一课。2015 年，新老师范丽敏入职的第一天，校长郑洪说了一席话：「我们的目标是让贫苦的孩子公平地接受教育，并且我们不是施舍口饭给孩子，而是给孩子吃山珍海味！」范丽敏当时觉得自己很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山珍海味」是指精神食粮，是最优良的素质教育文化。但她并没有对此太过认真，她想，这样一个简陋的学校，能够提供多优质的教育给孩子们？工作了几天以后，范丽敏有点服气了。她发现，这所学校的老师真的不含糊，备课的时候，一项知识怎么能够讲得好，要翻来覆去地琢磨，讨论很久。

可是半个月以后的一件事，才让她真的理解了什么是「山珍海味」。范丽敏班里有一个来自广西的侗族男孩，因为语言、生活习惯、课业水平等问题，一直难以适应学校生活，后来发展到排斥与任何老师和同学进行交流，上课不学习，下课不活动，作业也不写，就趴在课桌上抹眼泪。范丽敏使尽浑身解数，发动班里全体学生去逗他、帮他，最后发现全是徒劳。男孩宛若装上了屏蔽仪，把所有人拒之千里，最后甚至以绝食的方式逼学校放他回家。

范丽敏束手无策，只好向工作多年的教师张志和李桐求援。说是「求援」，范丽敏心里是清楚的，自己虽然没有明确地说想要放弃这个孩子，但言语里已经透露出信息：这个孩子简直无可救药。她没有想到，两位老师不但没有被吓退，反而异常耐心地给孩子做工作。李桐是个男老师，当时年纪还不到 30 岁，居然苦口婆心地和孩子聊到半夜。半夜孩子的家长来了，李桐还没有放弃，仍然不厌其烦地和家长分析孩子不适

应学校、排斥他人的原因。但是那天，家长最终还是把孩子带回家了。看到这个结果，范丽敏内心只觉得「好轻松」。

三天以后，男孩的姨妈又把他送回了学校。他依旧一言不发，见此情景，范丽敏「着实怕了」。那天正好学校的兴趣小组开始招生，李桐老师得知男孩其实爱好很广泛，在重组自行车、轮滑、种植等方面都有一些特长，就一个劲儿地朝这方面引导。三位老师相继加入「战斗」，想要抓住这最后的希望。然而，这孩子始终不肯点头留下。

范丽敏看到李桐又拉着孩子单独说了好些话。最后，孩子还是说要走，并且和老师道了别。这就是结局吗？范丽敏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那天中午，男孩竟然回心转意回到了班级。后来，她问李桐到底发生了什么？李桐说，孩子虽然内心依旧矛盾，但他觉察出来孩子对学校已经产生了兴趣，就在送孩子走的时候，使了一点激将法，没想到孩子真的和他一起调头回来了。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范丽敏见证了孩子从排斥他人到主动说话，从眼泪汪汪到眉开眼笑，从课堂上的昏昏欲睡到认真做笔记、主动问问题的变化过程。看到他笑眯眯地和同学打招呼，在课堂上颤颤地举起小手，在食堂里自在地去盛第二碗饭，范丽敏的心情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我问李桐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我想知道他最后到底使出了什么激将法。可惜他说，他只有一点点印象，具体细节都已经忘记了，因为这样的事「比较多」。

我第一次见到校长郑洪的时候，她和我说起学校的孩子，随手拿起刚收上来的一份作业。这个学期，她教初一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课，布置了一篇小作文，让孩子写写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郑洪从里面抽出了一份，整张作业纸被写得满满的，然而，这个孩子写下的每一个「字」我都不认识。拿着这份作业，校长有点激动：「你看这个孩子多可爱啊，他一个字都不会写，可是他把作业纸都写满了！」

再次和郑洪见面的时候，我又提到这件事，我很好奇，一个老师的天然反应难道不该是担忧学生到了初一年级还写不出一个正确的字吗？

「重要的不是字写得清不清楚、对不对，而是他写了这么多，让你知道他有表达的冲动。」郑洪说，「这远比写字本身更重要，字是可以练习的，而发现了这一点就是发现了希望。」

郑洪告诉我，开学这么久，这个孩子羞于表达，班里说话轮不到他。上课的时候，她让孩子们写点东西，他从不动笔。其他同学会说，老师，他有毛病，他不会写的。能怎么做，郑洪也不知道，她只能去试、去等。

「在你的课程里，他突然动了心。」这确实是一个令教育者雀跃的时刻。「他写的这些东西就让我知道，我不能放弃他。」郑洪说着又有点激动了，「这个孩子可能前面的6年都被甩在一边。这是一个生命啊，你得尊重每一个生命，直到他不可救药。可十二三岁的孩子，怎么就不可救药了呢？谁有权利说这样的话？谁有权利把他们打入另册？凭这篇作文，我就知道，这个孩子已经有了一些东西，他可以获得更多的东西。」

收到这篇作业以后，郑洪把学校负责心理咨询的老师找了来，让她有机会和孩子聊聊。郑洪不敢轻举妄动找孩子谈话，她觉得和他进行深度交流，自己还不够专业。但郑洪也没有「按兵不动」。「我想我必须得跟他说一句话，因为他一定会关注我对他的反应。」郑洪再去班里上课时，开课前，她对孩子说：「你上次写的东西我都看了，你的心我懂了。」男孩笑了笑，挺不好意思的。

段孟宇后来告诉我，她也注意过这个孩子。她给这个班上历史课，第一节课让学生们自我介绍，这个孩子没有参加。她和孩子说话，孩子从来不理睬她。同桌孩子向段孟宇解释说，他有点自闭症。段孟宇问过班主任这件事，班主任告诉她，孩子的家长确实也是这么说的。最近，段孟宇发现，她再和孩子说话的时候，他会「嗯嗯」地回应了。

刚到蒲公英的时候，就有老师领着我看学校墙上陶行知先生的两句话，说这是学校特别看重的东西：「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蒲公英的校训里也有「求真」。「真」这个字出现在学校的墙上，不足为奇，甚至可以说司空见惯。很多时候，它好像看不见、摸不着。

周四的教师教研会上，老师们分享自己小组的阶段成果，切磋下一步怎么推进工作。一位新老师做的课题特别好，给大家看了课堂录像。录像里，老师提问：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课题呀？学生发言，小胳膊规规矩矩地放在书桌上，字正腔圆地说了一遍。第二段录像里，老师开始带他们念诗，孩子们的状态全变了——一个个扯着嗓子喊，手舞足蹈。

录像放完了，让新老师邓伟华印象深刻的是，郑洪就此说了一段话：今天的录像是个很好的范例。它告诉我们，什么是孩子的真实状态。前面这段录像里，课堂很漂亮，但它是老师安排出来的。我们教课不是为了漂亮，请大家一定让孩子保持最真的状态。

后来我和郑洪提起这件事。「老师是一个很真的人，他才能带出真孩子来。大家其实知道真是什么意思，但新老师总得在上面打几个滚，折腾几回，才能看清楚这有多重要。」郑洪说，「你讲课追求什么样的效果，是哗众取宠，讲完了就算了，还是想要有影响力真正作用到学生身上？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只是来拿份工资，还是你对自己的人生也有追求？这个『真』字，是生活里回避不了的课题，但太多的人选择了回避。」

我在蒲公英观察到的是，对一所学校而言，最基本的「真」就体现在日常课程一点一滴的环节里。

开学的时候，大家都要例行做自我介绍。有一次，一位老师在教研会上突然抛出了一个问题：自我介绍是不是就是说出叫什么、来自哪儿、喜欢什么？每个老师听了一遍，学生重复了十几遍，这样的环节到底价值在哪儿？

一时间应者云集，大家七嘴八舌：「就是！」「学生是把名都报了一遍，老师当时能记住几个？」「我就是这么做的。」「可是，不自我介绍又不行，总得相互了解一下吧？」最后，老师们干脆来了一场头脑风暴，各种五花八门的自我介绍办法出炉。

地理老师决定唱「我家来自黄土高坡……」，让学生猜自己的籍贯。学生可以在地图上找自己的家乡，然后根据家乡常吃的粮食是大米还是面食，地理环境是山多、河多，平原还是海边，起立或者排队。数学课

上，老师展示和自己相关的数字：年龄、体重、身高、兄弟姐妹人数、教龄、家乡到北京的距离、教过的学生届数、在蒲公英工作的时间等等，让学生猜猜每个数字的含义。学生也可以做这样的「自我介绍」牌，相互猜，老师可在学生中走动，边猜边认识学生。体育老师计划准备一些体育器材，学生根据自己喜欢的运动分组，同组的学生进行 PK，用这种方式认识彼此。

在旁听李时来老师的道德与法治课时，我听出了她的一些心思，想把一些空泛的道理说到孩子心里去。那节课讲「友谊」。在让学生回忆自己有几个知心朋友的时候，她会讲自己的故事。她小时候的知心朋友是一条小狗，她觉得有什么话都可以对它说，在它面前觉得很安全。我理解，她是试图用自己的真实经历，唤起学生类似的情感。

李时来还让学生们讨论成为知心朋友的条件和要素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陌生人会变成知心朋友。讨论结束后，她问大家：「知心朋友是一成不变的吗？」

她告诉孩子们，初二的时候，会有一些同学离开学校回老家。她在学校的心理咨询室「爱心小屋」工作，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两个好朋友要分开了，留下来的人很难过，走的人也很伤心。「这是很正常的感受。」她说，「我想让大家知道，未来不管发生什么变化，在陌生的环境里，要有信心，你会有新的朋友。你也不要埋怨老朋友不和你联系，大家都要打开心扉，拥抱新的环境。」

后来，在学校做采访的时候，我听说了一件事，校长郑洪在这个学期教初一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课，为此每周她都会抽出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和李时来老师一起备课。我很好奇，想象不出这样一门课程还能有什么玄机，还能教出什么花头来，于是就去旁听了一次备课。

备课是从刚收上来的作业说起的。老师们让孩子拿着他们设计好的问卷去采访三个成年人，让他们谈谈「他们有几个真正的朋友」「喜欢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交朋友的方法」「最看重朋友的哪些方面」「朋友给自己带来的影响」「与朋友相处要注意的事项」，然后写下自己的感受和心得。

两位老师都很兴奋。我听她们讨论，发现一项作业写下来，她们的收获能有一箩筐。其一是孩子的反馈。一个孩子写道：「我喜欢这样的活动，因为我就是喜欢。我体会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和对友谊的理解，我也懂得了怎么交朋友……今天我们还采访了张艳鸽老师，我感到很荣幸，他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交友之类的话。」另一个孩子写道：「通过这次活动，我能发现成年人很看重将心比心，坦诚。我觉得这两点是很重要的，以后也要这样做。我也很喜欢这样的活动，让我很勇敢……我发现我成长了，不会像当初（小时候）那样对待别人，让别人对我有误会，现在不会了……」

李时来说，这是她们第一次让这些孩子用采访的方式来完成作业，没想到这几个平时让她特别头疼的孩子都破天荒地写了很多。尤其是第一个孩子，「以前从来不参与课堂互动，就是戴个帽子，晃来晃去」。还有很多孩子问：以后还有这样的活动吗？

其二是教训。怎么问问题，与人交流，孩子们不知道，既不懂得介绍自己，也不说明来意和缘由。「这是我们这次的疏忽，没有给他们做专门的培训。」郑洪和李时来商量，「这个能力，以后要专门训练，多练几次，能力就出来了。」

其三是未来可资借鉴的经验。「学生得动起来，活动中才有意外收获」；「舍得花时间，在课堂上教学目标不求多，在一点上做透」。还有一点，有不少孩子采访自己的父母，有的父母很配合，孩子记录了很多东西；有的父母则显得很敷衍。孩子们和接受采访的志愿者老师也吐了一大通亲子关系的苦水。「以后家长工作怎么做，家长会怎么开，也得仔细研究研究。」李时来建议，期中考试马上就到了，可以趁这个机会给家长写一封公开信，商量两件事情：第一，请家长别光看成绩，和孩子过不去，孩子还有很多闪光点；第二，接下来要上的课程也会有请孩子采访家长的心路历程，希望家长「给孩子也给自己一个彼此了解的机会」。

接着，两个人又开始讨论，下面的课程到底能够设置什么活动。关于友谊的内容，她们有一个新点子，让孩子们戴着面具或者口罩和陌生的同学交流，尝试交朋友。他们想让孩子真真切切地体会一下，当自己的面目被掩藏的时候，他们说话、待人的方式是否会发生变化——这和孩子们所处的网络环境是类似的。但是这个活动具体怎么做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还得推敲得更细致一些。

「以前我们也觉得，这门课谁都能来上，不就是讲道理嘛，可是你会发现，你讲道理，孩子比你讲得还好。」郑洪说，「你真的得去好好设计，能够走进他们心里去，这节课够着几个孩子，下堂课再够着几个孩子，再下堂课……这就是当老师。」

在蒲公英，很多人都会特别骄傲地和我说起一件事：我们这里的孩子一看就和别的学校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有很多外在表现。孩子们不回避成年人。我在学校里走，遇到学生总是被问「老师好」，他们的声音热切，眼神不回避。

这个状态的意味我是慢慢体会到的。孩子们是自在的，没有顾虑的。在那个采访成年人友谊观的作业里，我看到一个孩子的心得只写了一句话：「在这个活动中，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在办公室站了好长时间，班主任问了我好多的问题，让我想跑也跑不了。」学校的墙上贴着一些小诗，写在五颜六色的纸上。一首《您的课》写道：「您的课让我昏昏欲睡，您的课让我如痴如梦，您的课让我的知识如潮水般增长。我感谢您的课。」

为了尽快熟悉这学期教的初一学生，了解他们对历史学科的看法，志愿者、历史老师蔺熠每周五中午饭后会约谈一个6人小组。我旁听了一次这样谈话。在学校礼堂里，老师、学生一人一个蒲团围成圈坐下来。蔺熠问他们谁回家还会看历史书，做练习册？只有一个女孩说自己看了，但是「做了一会儿不想做了」。蔺熠问她为什么，她很坦率：「选择题书上找答案没找到，想了一会儿想不出来。」

蔺熠问孩子们：你们觉得学历史有趣吗？有趣在哪儿，没趣在哪儿？

一个河南口音的男孩快言快语：「语文就是写写写，英语就是背背背，数学就是算算算。游戏虽然好玩，但是历史让人动脑子。历史有趣，有趣在有很多人物故事，要我说，把历史换成主科算了。」

另一个女孩的想法则是：「听不太懂。」蔺熠问她哪里不懂。「课上总是提到『政治』，『政治』是什么？」

孩子们七嘴八舌，有时候坐着，有时候趴着，有时候躺着。有一阵，河南口音的男孩突然爬到小礼堂另一边去了。两个孩子突然对他喝道：「敬！」男孩自言自语，高声诵读：「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他的同学纠正道：「不是安静的静，是尊敬的敬！」我这才明白，孩子们觉得男孩爬走了对老师没礼貌，叫他坐回来。对这一幕，蔺熠也有点意外。历史的第一节课，他曾经给孩子们讲到《礼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没想到，他们记下了，用到了这里。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孩子们讲了电子游戏里有哪些真真假假的历史，讲了为什么有时候大家不认真听课，讲了对期中考试担心。临走的时候，蔺熠说，下节课会给他们讲讲什么是「政治」。

这场「散漫」的谈话对蔺熠来说别有一番体会。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在蒲公英做了多年志愿者。大儿子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做了个决定，让孩子到蒲公英来读书。这个决定很多人不理解。有人提醒他，转学以后孩子的东城区学籍就没了，高中再想回东城可回不来了。有人说，农民工子女的孩子打架、骂人、说脏话。还有一种说法，好学校的价值是同学的家庭背景好。蔺熠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蔺熠是北京 93 号院博物馆馆长。93 号院博物馆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艺术传播，蔺熠经常去各个学校做相关的讲座和授课。第一次来蒲公英的时候，他很震惊。学生们和自己的交流非常踊跃，热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种生机勃勃的状态让蔺熠想起北京一所重点中学的超常儿童班。他原本以为，这种状态只属于那些最具天赋才智、拥有最多资源、最被认可和呵护的孩子。

在很多学校，蔺熠都觉得「孩子们好像包裹进了一个壳里」。必须承认，那些孩子也很优秀。有时候，蔺熠还在讲着课，学生的精致笔记小报就做出来了。他的 PPT 上有英文，随机叫一个孩子，都能用非常标准的发音读出来。可是蔺熠感受不到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他摸不到孩子的真实想法，就像在一个鸦雀无声的课堂里，老师并不知道一个安静的学生是不是真的在听他的课。

作为一名父亲，蔺熠慢慢理解了这种状态。孩子们天生擅长琢磨成年人的心思，躲避批评，追求赞美，在这个过程中，真实的自我越来越退缩。他看孩子写作文，技巧纯熟，「和好莱坞电影一样，怎么拉高潮，如何结尾，什么样的话是正确的，都有章可循」，唯独没有真情实感。有一回，学校布置了一个作文题写「云」。孩子从小就跟着蔺熠看博物馆，听他讲瓷器，于是很有表达的欲望，就把对瓷器的欣赏和这个主题联系了起来：钧窑的火红像晚霞，汝窑则是「雨过天晴云破处」。不料，这篇文章被评成了三类作文，理由是它和课本的一篇文章构思有类似之处。年级一位负责老师说，孩子就不该这样写，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写得过一位大家。



Featured in *Lifeweek*, December 6, 2021. Before it's here, it appears in the [Overlook](#).

去远方

有一次，郑洪在开学典礼上问孩子们：「你们知道『教育』这个词在英语里怎么说吗？」她告诉大家，在拉丁语词源里，前缀「è」有「出」的意思。这个「出」的意思，给教育这个词赋予了明显的含义：第一个含义是让潜质自内而外地焕发出来。「教育不是从外面给一个人加上什么、贴上什么，而是把原来就存在的潜在素质引导出来。」

第二个含义，就是「内在的潜质人人都有」。怎么找到这个潜质呢？郑洪对孩子们说：「在咱们学校，释放自己的潜质不难，途径就是，全面参与到各方面的过程中去……你的内在潜质会在丰富多彩的过程中被自己发现，被别人发现，得到释放，得到唤醒……一定要全面参与，高高兴兴地、兴致勃勃地参与。」

除了夏令营的各种小组、定期及不定期的活动，每个学期，蒲公英中学的日常课后还有 30—40 个兴趣小组。做兴趣小组，学校是认真的。带兴趣小组的老师有津贴，算下来，一次小组活动的津贴可能比上一堂课还要多。兴趣小组也得签到，受教务考察，做学生满意度调查，也得参评。学期结束的时候，每个小组要张贴广告，告诉全校师生，哪一天会进行成果展示，欢迎大家来观摩。

校长还有一个特殊要求：老师带兴趣小组不能「就便」，数学老师搞个数学提高班，那是不允许的。她对老师们说：「你有什么兴趣爱好，有什么人生未完成的理想，你就去干那个。」她要把老师新的热情激发出来。于是，出现了计算机老师做再生纸制造，数学老师搞编织，语文老师教乒乓球。

郑洪也犹豫过，学生基础这么差，老师又这么缺，学校还开展这些活动，顾得上吗？真的需要做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她也是从学生那里得到的。每学期，学校规定一个孩子只能参加一个兴趣小组，有的学生为此给郑洪写「条子」：校长，我想报三个组，你能不能和老师说一下，通融通融？「看到他们的状态，我就知道，这是孩子们兴致勃勃想要做的事。他们不是我们这个岁数，他们十几岁，他们需要这个，享受这个。」

享受的价值在哪儿？「每个兴趣小组都是机会。很多孩子可能学习不好，但他们只要在一件事情上做好了，成了老师的小助手，一下子就有了自信，这就是一个转变的机会。你不做这些，怎么给学生机会？教育公平不是空的，公平意味着你要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机会。」

「机会」这个词解释了我对蒲公英的许多观察。

「机会」并不只存在于让人眼花缭乱的活动里。有时候，它就是接纳。2020 年底，藏族女孩桑措从阿坝师范学院毕业，成为蒲公英的教师。和段孟宇一样，桑措也完成了她的转身。1997 年，她出生在阿坝州的一个村庄，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弟弟。7 岁的时候父母离世，年长大哥承担起了抚养弟弟妹妹的重任。不料桑措念到三年级时，大哥在劳动中意外受了重伤，卧病在床。桑措不得不休学在家，承担家务。

2010 年初，同族叔叔查卓保来到桑措家做客，他是青海桑坚珠姆女子学校的校长，长期义务招收藏区的孤女来校就读，桑措因此重新获得了读书的机会。在桑坚珠姆女子学校，桑措和北京志愿者王聪聪成了好朋友。聪聪带桑措到北京学汉语，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们知道了蒲公英中学。桑措想留在北京上学，聪聪的妈妈找到了校长郑洪的联系方式，郑洪听了情况后，就说了一句话：「送过来吧。」

那时候，桑措的汉语尚不流利，学业非常吃力。第一次英语考试，她只考了 9 分。有一次，桑措又考了年级倒数，她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流泪。校长从后门进来，亲吻了桑措的额头，说：「你要继续努力。」桑措说，她永远都忘不了这个吻。

有时候，机会意味着认可。在蒲公英，我常常发现，老师们很擅长从一点一滴的细节里发现孩子的闪光点，并且由衷地欣赏。物理老师秦颖是这学期研究型学习项目的总负责人，她告诉我，其实学校很多年前就在做项目式学习，尽可能提供不同的学习方式。多年前，有一个孩子给了她很大的启发。当时，她组织做「水火箭」比赛，以水为动力，发射矿泉水瓶。比赛的前一天晚上，已经午夜了，她发现教室里还亮着灯，一个男孩在埋头研究改进自己的装置。这个男孩在班里成绩排在倒数，可他的动手能力以及他的这股劲头让秦颖牢牢地记住了他的名字。

一次期中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晚自习下课后，因为要布置考场，老师张忠源组织学生把多余的课桌搬出教室。刚搬了几个，一个平日寡言少语的男生走到他身边悄声说：「老师，我看到学校宣传板上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有雨夹雪，如果把桌子搬出来，遭雨淋而受潮，会影响使用寿命。」张忠源看着这个孩子笑了，没想到他这么细心。男孩看出了老师的惊讶，腼腆地说：「老师，我每天都关心天气，因为我爸爸在建筑工地干活，整天都在室外，天气不好我要提醒爸爸多穿点衣服，免得受凉。」张忠源把这件事写在了他的教师笔记里。他很感慨，这个孩子关心自己的爸爸，同样关心自己的班级，把班级当成了自己的家。他这个班主任都没有想到的事，却让一个孩子想到了。

袁小燕是学校的音乐老师。一个孩子报名参加学校的小提琴队，过了一段时间，袁小燕才发现他的左手有残疾。原来选学生的时候，这个孩子给手指缠上了胶布，教小提琴的老师没发现。练完一个学期，孩子来找袁小燕，他的手指因为拉琴总是很疼，已经红肿了起来。

其实，老师们私底下早就讨论过，这个孩子的情况很难适应拉琴，但他们害怕打击孩子的积极性，没有和孩子提起过这件事。袁小燕问他：「你还能坚持吗？还想学吗？」孩子说：「我还想学，可是手指总是痛，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袁小燕试探着说服他：「要是实在太痛，可以考虑不学了。你回去好好想想。」

第二天上完课的中午，袁小燕又看见这个孩子背着琴，愉快地从琴房里走出来。他说，他和小提琴老师商量过了，决定继续拉，拉琴的时候就给手指绑上胶布。这种坚持，让袁小燕觉得很震撼。

这一切的机会，背后所有的用心，指向的是哪儿呢？

在学校里和老师们交流，似乎没有人向我提中考，这和学校的对外宣传不太一样。「现在我们拿出成绩来让大家看看，只是因为成绩是一个定量指标，这是一件大家容易认同的事，但是获得这样的升学率，前头的功夫是什么？不是那么容易能说出来的。」郑洪对我说，「分数只是孩子状态变化的表现，是你把一切事情做完之后，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

在蒲公英，学习成绩落后的学生不叫「差生」，有一个称呼叫「盘旋路」。关于中考，让郑洪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考前的最后一天，一个孩子突然跑回学校，说他要考试。他有一个星期没有来学校，已经出去打工了。还有一个孩子，在校三年考试从来没有及格过，中考成为他学业最好的那一个点，三年走下来，他终于及格了。

去年，李时来也加入了初三学生的帮扶小组。一个男孩初中三年都在混日子，本来不打算中考了，「反正也考不好」，李时来劝他打起精神：「人生里其实就是几个关键点，中考就是一个。并不是说一定要考出什么样的成绩，但你是否认真对待过它，你获得的体验是不一样的。一旦你负责任地对待了这件事，未来你就可能找到那种对自己负责的状态，你可以积累很多信心。」

这个孩子很认真地准备了考试。和预料中一样，考试的结果并没有发生戏剧性变化，他去读了职校。这样的努力和坚持值得吗？今年开夏令营的时候，男孩回到学校来做志愿者，工作起来特别尽心尽力。他每次看到李时来都是一副高兴得不得了的样子，他说很怀念初中三年的生活。他在职校学了一年烹饪，现在比较清楚自己未来的出路，想开一家小饭馆。他还对李时来说，如果学校有什么事需要帮忙，他随时待命。

这些年上课，李时来总在琢磨，给孩子们什么东西，他们未来能够用得上。这些东西是一颗种子，埋在土壤里，播种的人可能并不会看到结果。两年前，李时来在志愿者的牵头帮助下组织过一个「人生七十年」的生涯体验活动，183 名学生变身成 24 岁的自己。在活动里，他们创业开公司、做公务员，在大学、医院、建筑院、银行等机构工作……他们还穿上礼服和婚纱，体验结婚生子、为人父母。在这个过程中，有人重新回到学校提升了学历，有人用赚到的钱改善了生活条件，也有人遭遇了战争、伤痛和死亡。最后，大家在烛光里给自己写下了墓志铭。

孩子们后来在感悟里写道：「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听从内心的想法，时间可贵，人不可贪心，对人生要有一些新的目标。」「人生的舞台，没有排练。」「开心是一天，难过也是一天，那么就好好开心地活下去吧。」李时来并不知道，这 4 个小时的模拟人生能给这些初二孩子的心里埋下什么样的种子，但她觉得，只要能让孩子对人生的马拉松有一点感悟，对可能遇到的困难有一点准备，功夫就没白费。

办了 16 年学校，郑洪现在会理直气壮地对学生说：「我们要成为国家的栋梁。」总有人觉得她这个说法不实事求是：「这样的学生和栋梁有什么关系，和精英有什么关系？」她反问：「有钱有权才叫国家栋梁吗？我觉得正人君子就是国家栋梁。这个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我们的孩子能成为正人君子。」

一次，有个美国志愿者告诉郑洪，有一个学生的话震动了他。这个孩子说，「我来蒲公英的时候，想的是怎么做一个好学生，今年我毕业了，想的是怎么做一个好人」。

这是让郑洪最骄傲的事——孩子们心里有善意。有个男孩厌学回家，全班同学自发地每个人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回来上学。班长带着这些信上男孩家里，男孩不开门，班长就站在窗户边儿，一封封地念，最后是男孩的爸爸忍不住打开了门。

北京一家民办高中与蒲公英合作，让蒲公英的孩子去念高中，给他们单独开一个班。民办高中的一位老师告诉郑洪，有一天上晚自习，他走到这个班的外面，听到里面有人上课，发现班里成绩最好的孩子正在给自己的同学补习。这位老师说，他教了这么多年书，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景。

郑洪还记得一个孩子在学校里天天给食堂的师傅帮忙，后来孩子因为家庭变故，出现了心理状态不稳定，只能暂时休学回家。老师们打电话问他的情况，没想到孩子却说：「食堂的师傅现在有人帮忙吗？他们忙不过来怎么办？老师，您和我们班同学说说，让他们去帮帮忙吧。」

在学校感恩室的展示板，我注意到了欧安乐。在一堆大企业、志愿者的环绕下，她显得有些特殊。从蒲公英毕业以后，她没有考高中，直接进入了职校。她辗转干了好几份工作，现在是一名糕点师，开了一家自己的网店。几年前，她给学校捐了两台烤箱，做了一个食育教室，还来给学生上过烘焙课。

欧安乐告诉我，毕业 11 年了，她还是经常梦见蒲公英。欧安乐的老家在内蒙古赤峰市，来蒲公英的时候已经 14 岁了。母亲在她 8 岁时去了北京，她和父亲一起生活。父亲不务正业，打架斗殴。欧安乐吃了 4 年的百家饭。12 岁时两个姐姐已经长大离家，妈妈不放心欧安乐在老家，把她接到了北京。

没到北京之前，欧安乐想，北京一定是个特别干净的地方，只有天上飞的东西，不会有老鼠，也不会有蟑螂。妈妈住在大兴鹿圈三村的一个大杂院里，狭长的院子住了很多户人家，妈妈的房子后面就是一个巨大

的垃圾场。

欧安乐是 2007 年入学的。那还是学校硬件条件特别艰苦的时期，但这些艰苦的事，她现在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她对学校的第一印象是「特别暖心」。去上学的时候，她终于感到自己不被另眼相待了。刚来北京，欧安乐去公立学校考过试。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站在一堆阿迪、耐克中间，别人投来的眼光，让她浑身不自在。即使在老家的时候，爸爸品行的问题和她比较差的成绩，也让她一直是个不被待见的孩子。

到蒲公英报到没多久，欧安乐就参加了夏令营。她记得有好多志愿者，外国的，清华、北大的。平时能见到一个外国人就很不容易啦，没想到这些人都对她那么好，她觉得开心。她还记得，在学校吃饭的时候，老师教导他们：「你们每个人每天吃的鸡蛋，每个周五吃到的鸡腿，都是别人捐赠的。」安乐想，那可是不能浪费呀。

欧安乐初一年级的班主任是已经离开学校的周学敏老师，她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新老师。开学不久，周老师到欧安乐家做家访，欧安乐给她带路，还一起去过好几个同学家里。细心女孩注意到，这个周老师特别喜欢穿白裙子，可是在学生家，家长请她落座，她从来没有流露出半分犹豫和嫌弃。

欧安乐发现，老师也喜欢她。班干部最早是老师指定的，周学敏选了安乐当班长。安乐说自己的优点是铁面无私，纪律管得严，不打小报告，乐观开朗，有眼力见儿。不仅如此，老师还说安乐的妈妈开明。安乐的成绩不好，妈妈到学校开家长会，也不埋怨，只关心学校环境如何，她吃得怎么样，和老师、同学相处得好不好。有一次开家长会，老师评选优秀家长，一个班只有两三个名额，安乐的妈妈被评上了。回家以后，安乐姐姐笑话妈妈：「人家都是因为孩子学习成绩好才评上的，你凭什么呀？」妈妈不管，她开心得很。

在学校，安乐觉得自己很能干。有一回，班里有个孩子的父母突然离异了，情绪低落，老师建议那个同学有时间和欧安乐聊聊天：「你看她的父母也离婚了，可她多乐观。」

班里还有个男孩是学校的老大难问题，他和校外的「混混」玩，还曾经拿着铁棍子在校门口斗殴。周学敏对安乐说：「有机会的话，也请你开导开导他。你这样爱笑，或许能感染他。」老师还说，他很聪明，只是聪明没有用在点子上；他也不是个坏孩子，其实特别善良。

欧安乐发现，周老师说都都对。男孩在校外打架是把人往死里揍，可是每次和同学起冲突，绝不下狠手。安乐找这个男孩聊天，他从来不曾摆出过「你有什么资格来教导我」的姿态。老师告诉过安乐，男孩很孝顺母亲。安乐就总是学着老师的办法说：「你要是变成了杀人犯，你妈妈以后怎么办呐？」欧安乐说话的时候，他不应声，也不反驳，只默默地听着。安乐想，不管他听不听得进去，至少他知道自己是好心。

好像是半个学期以后，不知道为什么，男孩不打架了。欧安乐职高毕业后才又和这个同学有了联系，他在和妈妈一起摆摊卖铁板烧，收入还不错。班里的同学经常去他摊位上买吃的，玩一玩。欧安乐最后一次见到他大概是在 4 年前，他已经结婚生子，二孩都一岁半了。当时欧安乐提醒他：你和我一样没有正式工作，有没有上个保险什么的？他说自己没有，但给孩子们都上了。

从蒲公英毕业以后，安乐进了一家职校。在这家职校里，她才觉察出了自己的变化。在新学校，让她最意外的是同学满口脏话，她特别接受不了，这在蒲公英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安乐发现，进蒲公英之前，她挺自卑的。到了职高，尽管班里的同学家庭条件都很好，别人一天的零花钱一两百，自己一周可能也就二十块，但她觉得很正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喝不起可乐，少喝一点就是了。我问她这种自尊从何而来？安乐想了想说：「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孩子吧。」

后来安乐自学做西点，开始创业。那时候她还在北京，经常带着点心骑半个小时的电动车回学校看老师。有一回，安乐的二姐生了孩子，和她讲到现在养孩子要报舞蹈班、美术班，甚至还有烘焙班。安乐灵机一动：我上学的时候不是有很多志愿者去教课吗，那我是不是可以回学校开个烘焙班呢？那时安乐刚开始创业，赚的钱刚够维持生活，但她盘算了一下，买烤箱加材料，1000 块差不多够了，还是出得起的。

我没有想到的是，欧安乐对我讲述的故事在这里出现了转折。她说，其实以前学校有媒体采访过，也有人想采访她，但是她都拒绝了。这一次老师又来问，她不好意思再回绝。她告诉我，原因是，后来回学校的几次志愿活动，她的感受并不好。上烘焙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因为她的课程被安排在下午，结束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她还需要骑电动车回家。为安全起见，点心放入烤箱以后，她会叮嘱学校老师，等烤好后让孩子们尝尝，然后就先离开了学校。可是，她再来学校时，有几次问孩子们有没有吃到自己做的点心，得到的回答是没有。点心烤好以后，可能被分给了当天来学校的志愿者。

「我是自学做烘焙的。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教程，我也没有钱去参加昂贵的课程。每次从早到晚地尝试，最后终于成功了，你肯定要尝尝点心的味道。吃到嘴里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特别伟大。」安乐说，「我到学校去开一门课，不是单纯想表现自己回馈了学校，我是真的希望有那么几个孩子会为此喜欢上烘焙，觉得初中毕业后，哪怕上不了高中，也有自己想做的事。如果这个过程不能有始有终，事情是不是变味了呢？」

安乐还提到，最后一次回学校是参加夏令营。她也开了一个烘焙课堂，因为参加课程的人数多，一个人忙不过来，她提前和学校申请，给她几名志愿者打下手。可是真的到了上课的时候，一连几天，志愿者神龙不见首尾，几乎是两个来上课的孩子承担了所有的工作。安乐那几天累得直不起腰，但她更心疼孩子。她告诉我，夏令营结束的时候，她有些愤怒，也很伤心。她感到学校没有管理好志愿者，真正愿意投身志愿服务的人，被辜负了。

「我还记得我读书的时候，那些志愿者是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我们班有个小女孩，性格比较中性，不喜欢穿裙子，不喜欢留长头发，我们班同学都笑话她，可志愿者会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不应该因为和别人不一样而受到嘲笑。穿裙子并不是女孩的标准。还有一次，一个美国来的华裔男孩和大家聊天，我们都觉得人家光鲜亮丽，很羡慕，可是他对我们掏心窝地说，他并不是一直都过得很好，小时候他也吃过很多苦，所以走到今天才会更愿意去帮助别人。」欧安乐说，「这是我理解的志愿者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像一些人，给每个学生买一杯奶茶，就好像做了贡献。」

欧安乐的「吐槽」，让我很感动。

给初一年级第一次上历史课的时候，蔺熠给孩子讲了《论语·子罕》里的一句话：「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句话的背后，他心里想的是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蔺熠告诉我，在蒲公英，老师们之间也经常讨论：怎么理解「教育改变命运」，教育到底能不能改变命运？蔺熠读历史。他想，古人考功名，学圣贤知识，并不只为了「阶层跃升」，而是怀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大时代的进程之中，潮起潮落，个人何其渺小。苏轼进士及第的时候，未曾想过会被贬黄州，又被贬惠州、儋州，但这并不妨碍他拥有飘逸旷达的内心世界。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体验都是不可被取代的，」蔺熠和我分享了他的想法，「『知者不惑』，教育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给人智慧——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世界中如何自处的智慧。」

志愿者赵莎在蒲公英中学服务了多年，很关心学校就读的藏族孩子，一直追随他们的成长。她有一种感受，人生命运里有很多际遇是教育无法左右的，而受到教育的价值有时可能又无法体现在当下。

有一个藏族女孩从蒲公英毕业的时候非常想去读幼师。但是她户口本上登记的年龄是错误的，根据这个年龄，她已经超过了幼师招生的年龄。后来她去成都当了一个演员，表演藏戏。赵莎经常和她联系。让赵莎觉得欣慰的是，尽管没有如愿，她还是很积极地在生活，并没有一蹶不振，没有过一种随波逐流的生活。

另一个藏族女孩顺利地在北京读了幼师。她功课不错，又努力，在班里从最后几名追到了前三名。幼师马上就要毕业的时候，她已经在北京青少年宫幼儿园找到了实习，而且还有可能留下来工作。可就在这个时候，女孩决定回老家结婚。赵莎一开始很不理解，但她还是选择了尊重。赵莎告诉我，藏族家庭有一个传统，家里的长子在父母老去以后有照顾整个家族的使命，是不可以离开老家的。这个女孩的恋人就是家里的长子。女孩对赵莎说：「我嫁给一个长子，那么我一辈子都要承担这个大家庭的责任。我是不可能到北京工作的。」

赵莎后来想，从人性的角度讲，这个女孩的选择也无可厚非。「她选择为家庭牺牲自我，你不能不说，这个女性是很伟大的。在一个传统的牧民家庭里，她如果真的能够用一己之力把弟弟妹妹抚养起来，你未尝不能说她是一个成功的女性。」赵莎说，「我们在蒲公英给她的教育是白费了吗？有一种说法：一个女孩子受到教育，就等于教育了三代人。所以，我相信她接受的教育一定不是白费的，她也一定会让这个家里的孩子都去接受教育。」

在蒲公英采访的时候，我得知学校刚刚有一名叫热沙卓玛的毕业生考进了 UWC 常熟分校。热沙卓玛让我觉得很特殊。她在初中时候的成绩并不好。蒲公英毕业后，她去上海，在嘉和基金的帮助下接受了两年的西点师职业培训，在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成为一名在大厦顶层工作的糕点师。

赵莎知道有一些藏族孩子其实很想考 UWC，但他们的基础比一般的蒲公英学生更弱，觉得自己没有机会。但是赵莎还是会鼓励他们有机会试一试。8 月底的时候，赵莎看到 UWC 常熟校区的招生还没有结束，就随手发到了藏族学生的群里面：「你们谁想考，可以考虑考虑。」没想到，马上有一条信息蹦出来：我想去。

赵莎也没有想到，说话的人会是热沙卓玛。热沙卓玛在蒲公英上学的时候并不是个引人注目的孩子。她只记得，这个学生英语成绩好，喜欢唱英语歌。

赵莎告诉我，热沙卓玛在酒店的工作其实挺不错的：酒店是五星级，她在工作中的人缘很好，也被看重。同一批进酒店的人，很多人只能在后厨，但热沙卓玛因为英语好可以到前厅和客人打交道。

当时，UWC 申请、考核实际已经截止了，但因为一些原因，又延长了一个月。热沙卓玛每天早上 5 点多起床，从宿舍坐一个半小时的班车到酒店。工作结束以后，晚上 6:30 坐班车返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 8 点左右了。这个时候，她才开始学习备考，准备申请材料。热沙卓玛告诉我，这一个月来，赵莎总是在给她发各种各样的参考资料。有时候，凌晨过后她睡下来，早上起来，发现手机上还传来了新的材料。

热沙卓玛经过二轮电话面试，一轮校园面试。录取前，学校担心她不能够适应课业节奏，让她去常熟参观试听了一次课程。最终发正式录取通知前，UWC 还打电话与热沙卓玛确认。学校告诉她，上 UWC 并不能够确保她考上大学，问她是否要再考虑一下。

热沙卓玛考 UWC，家里人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在很多人看来，五星级酒店的一份工作，意味着她在上海这个大都市已经有了立足之地，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呢。热沙卓玛告诉我，其实她并不知道念完两年书之后，自己会有什么具体的收获。她所清楚的是，在酒店的工作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她愿意为寻找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冒一下险。「就算从 UWC 毕业以后，考不上大学，找不到什么好工作，这两年经历也会很珍贵。」热沙卓玛说，「我和妈妈说了，赚钱的事情，只要你努力就一定可以赚到，还是做热爱的事情比较重要。」

我电话联系热沙卓玛的时候，她已经开始了在 UWC 的生活。她告诉我，刚开学的一段时间里，因为学业的难度太大，她曾经一度很怀疑，是不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后来她找学校的顾问谈了自己的困难，老师们正在帮助她补课，她已经从情绪的低谷里走出来了一些。后来，赵莎告诉我，其实热沙卓玛心里还有点负担，担心自己辜负了赵莎的期望。赵莎和她讲：大胆往前走，不用顾及任何人的想法。大不了，再回来当糕点师。

热沙卓玛的勇气特别让我触动。后来我想，这种热情和勇气，在热爱做西点的欧安乐身上也有。在从哈佛回到蒲公英的段孟宇身上一样存在。

2011 年，从蒲公英毕业时，小孟宇曾经在求学路上有过短暂的迷茫。2018 年，她从路德学院毕业时也遭遇了一次抉择。她的内心里很想继续求学，但是担心经济上的负担，非常犹豫。毕业以后她一度到波士顿一家教育创意公司工作。但是她发现这家公司的技术并没有创新，在宣传的时候又一味吹嘘。她还是决定把工作辞去，一面在一家基金会工作，一面申请研究生。虽然这样做了，但那个时候孟宇的心里是很矛盾的，她需要养活自己，也想要回馈父母，对未来研究生的方向也还没有十分笃定。她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不是就是正确的。

孟宇说，2019 年的一天，她在波士顿图书馆学习，收到了校长郑洪发来的一条长长的信息。郑洪说，理解她在现实中面临很多具体的问题，也在思想和感情中面临冲突与困惑。「凡事总是有得有失的，生活总是喜怒哀乐的，成长总是要选择和决策的。」郑洪鼓励她继续求学，拥抱未知，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路。孟宇说，收到这条信息的时候，她在图书馆泪流满面。

今年从哈佛毕业的时候，孟宇没有再次遭遇迷茫。在哈佛教育学院，她慢慢明确了自己要做的事。她学习的方向是教育政策。她意识到，政策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决定研究生毕业后，先亲身体验理解一线教师的工作，再申请博士学位。孟宇的一位好朋友在国内一所国际学校就职，那边很欢迎孟宇去当老师。国际学校的优势很明显：收入高，做实习老师期间有专人指导。但是孟宇还是谢绝了邀请。因为她意识到，她最终想做的是弱势群体的教育帮扶。国际学校服务的政策，沟通的人群，使得制订教育计划的方式会完全不同。

我曾经试图为这种热情和勇气的来源寻找到一个直接了当的解释。后来，我发现，内心的火苗何时因何燃起，当事者也并不明了。但后来，结束在蒲公英的采访的时候，我又觉得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还记得在美术教室里，裴广蕊老师和我说起，她因为图书馆、美术教师和叶蕾蕾老师留在蒲公英。裴广蕊在西安美院学习的时候，她发现，每年寒假回家，她都会迸发巨大的创作热情，她觉得和自己的生命与经历息息相关的东西才最能够调动情感，激发艺术表达。

于是，裴广蕊带学生画父母的手，让他们从老家带回不同颜色质地的泥土，一起制作作品。学校所在的寿保庄村、老三余村还没有拆迁的时候，她带学生进村子里去写意。学生的画纸上什么都有，冬储的白菜、电动自行车、木质的门框、水果摊、破扫帚……等到老校区附近很多房子被拆除了，她又带他们去描绘拆迁现场。疫情上网课，裴广蕊就让孩子们画自己家里的厨房。

「城中村是有多么有生活气息的地方，破破烂烂的地方会有岁月的痕迹。」裴广蕊和我感慨地说，「疫情的时候，看学生画的厨房，我就假想，我要有一个翅膀，我能飞到他们家里边去给每个人指点，他们绝对能画出非常棒的作品。」

在学校十多年，裴广蕊带着学生跑过无数展览。怀胎八月的时候，裴广蕊带着学生挤公交车去看展。她说她的老家河北，高中的时候，她和父亲说想去北京看展览。父亲说：「我还想去呢！」在西安美院上学的时候，有同学坐火车去上海看展，让她羡慕极了。「我其实觉得，我对艺术还是有非常强烈的追求。我就是喜欢。只要是和美术相关，我觉得这个资源好，我怎么也要把它抓住。」

2016年，李时来到蒲公英来面试。那时候，她是北京一家国家级期刊编辑部的责任编辑。蒲公英旧校园的环境，和她的办公室相比，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收入自然也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李时来心里说，就是这里了。她从小就想当老师。上师范大学的时候，她参加了学校公益社团，2008年去汶川地震灾区进行过支教。那次支教让她深深感受到了帮助他人所能获得的自我价值感。

但最打动李时来的是，当时接待她的王瀚宇老师带着她——一个初面试者——参观了校园，仔仔细细给她讲学校的故事。她觉得一位普通的老师竟对这个学校的一砖一瓦都充满了感情和自豪，这是多么有爱的一个地方。李时来说，她永远忘不掉那一幕——那是一个北京春天阳光灿烂的午后，听着王老师的介绍，她望向操场，一队学生在志愿者的带领下打着太极拳。李时来觉得，她好像突然进入了理想国，她想：「啊，这就是我要去奋斗的地方。」

全文完

